第35卷 第3期 财经研究 Vol. 35 No. 3
2009年3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Mar. 2009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邓可斌[1]，丁菊红[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2.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摘 要：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对"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关键词：经济转型；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结构模型；系统广义矩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3-0080-11

一、引 言

转型经济国家的财政分权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公共品供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中国为例，分权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然而，就公共品供给领域而言，我国却呈现出"软""硬"不一致的局面：基础建设类的硬性公共品投资增长迅猛，各地高速公路、轨道、机场及城市公用事业变化惊人；而医疗、教育、卫生等软性公共品投资则显得相对不足且效率不高。① 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在几年前曾指出：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进一步的改革正在摸索中。针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呼声不断。这些领域改革的效果为何如此截然不同？是转型经济中偶然的现象，还是分权改革的必然结果呢？本文试图对其中的机理进行探讨。

现有文献虽然对财政分权已有不少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分权和集权作为外生制度离散变量来考察，难以深入窥察财政分权的

收稿日期：2008-1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BGJ007)

作者简介：邓可斌(1977－)，男，广东罗定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丁菊红(1980－)，女，安徽芜湖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变迁过程及其与经济增长、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就中国而言，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公共品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使得从西方联邦制中演变来的财政分权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中国实行政治集权，因而财政分权是在中央政府统一框架下进行的，其中不仅涉及各级政府信息不对称，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实质上政府间的利益调整。而公共品在政府利益的调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其供给的质和量上我们可管窥财政分权的演进过程。

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截面与时间序列数据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进行解析，以动态的方式思考转型中财政分权的变迁过程，及其与公共品供给间的内生关系。

二、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能力——讨价还价的力量——取决于发展中各地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流动状况。改革之初，各个地区经济水平均较低，且差异也不大。相对“软”公共品，全国民众更需要能迅速带来经济增长的“硬”公共品。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公共品带来的经济产出偏好基本一致。而且，地方政府此时经济实力有限，博弈能力不强。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博弈第一阶段。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事先规定的“包干制”为特征，这类似于一种固定租约，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采用的财政分权基本属于此模式。这一分权方式的特点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倾向于投资收益明显的硬性公共品，因为其投资见效相对软性公共品更快。中央政府之所以愿意让地方政府更多地生产硬公共品是因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此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信息，于是其生产公共品特别是生产硬公共品，只需要相对少的成本就能取得更大的产出。此外，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还可以让中央政府充分了解地方政府的信息，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共品收益分配的合同更接近完全信息合同。“包干制”的分权方式很快得到了众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地基础建设的投资热情随即被带动起来。总的来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在这一阶段显著激励了经济增长。

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显现，而高分权降低了中央的转移支付能力，加剧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公共品带来的经济产出偏好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一方面，公众此时对“软”性公共品的偏好增加了，另一方面公共品供给带来的溢出效应（外部性）逐渐体现。而中央与地方政府生产的公共品的溢出效应是不一样的。无论“软”“硬”公共品，一般而言中央公共品的溢出效应均大于地方公共品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公众对“软”公共品和溢出效应强的公共品的偏好更强。但是，地方政府却会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分权程度，因为这样地方政府就能更多地掌控“硬”公共品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公众偏好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传递都需要时间，因此暂时无法对地方政府的偏好构成压力。于是博弈进

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的偏好是高度分权,而中央政府仍会维持原有偏好。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最优分权度开始不一致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此时与中央博弈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如果经济增长快的地区同时也是人口较密集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博弈能力将更强。所以,在人口较密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这一阶段分权度会逐渐提高。在人口较稀疏、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公众仍更多地偏好硬公共品,地方政府虽然对中央博弈能力不强,但加大分权度一方面能使其经济增长加快满足公众偏好,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政府带来效益,且与中央的利益并不相悖。因此,人口较稀疏、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分权度也会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并不快。

当然,在经济增长快的地区,由于公众对软公共品的偏好逐渐增强,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部分承担起软公共品供给的责任。但一方面,由地方政府提供软公共品会大大降低其正外部性,而增强其地方性质,从而失去软公共品的特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通过GDP的增长来获得升迁的政绩,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隐性收入,故其必然会更偏好硬公共品投资(如基础建设投资),往往会把投入软公共品的资金用于硬公共品投资。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就会出现硬公共品供给过剩而软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公众福利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

这一阶段末期,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偏好对地方政府的压力逐渐加大,会迫使其改变对硬公共品的偏好,加大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力度以减小分权程度,从而提高中央政府的软公共品投入。在经济能够进一步增长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求的分权程度可能会在逐渐博弈调整中达到一个较好的均衡,因为地方政府生产软公共品的能力随经济增长会逐渐增强,这可以部分减缓公众"用手投票"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压力加大,地方政府也会愿意降低分权度以满足公众要求。而中央政府也将进一步发挥其管理协调作用,做好各个地区分权度安排,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

我们相信,目前中国处于博弈第二阶段末期。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致的情况较为突出。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等),公众对公共品偏好不断增加,尤其对软公共品的偏好(医疗、教育等)增加得更快。这种地区民众偏好的改变正在通过各级政治团体传递到地方政府,逐渐表现出地方政府偏好的改变,使得这些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降低分权程度,加大软公共品供给。在一定的政治压力下中央政府会考虑地方政府意愿,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分权程度的偏好会逐步趋于一致。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已从侧面体现了中央财政集权的加强,且这种体制也更有利于中央对软性公共品的供给。从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决定对西部农村的所有中、小学生免杂费;今后5年,中央政府还将安排专项资金,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到2010年,实现对全国农村地区全部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些措施都体现了中央政府软性公共品供给的加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随着经济增长，分权程度容易出现过度，地方政府会要求中央政府减小分权程度。同时过度的分权程度会使硬公共品供给过多而软公共品供给不足；(2)无论人口密度高低，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都会放松，但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放松得更快；(3)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会减弱。基于理论分析结论，再考虑到分权程度的持续相关性，即即期分权程度与上期分权程度相关，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实证研究假设。

H1：分权程度增长越快，硬公共品供给增加越快，软公共品供给增加越慢。

H2：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增长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

H3：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

三、指标选择与实证方法

(一)指标选择

1. 分权程度指标。有关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在分权指标选择上也出现了多种方法。Ma(1997)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表示财政分权度。Jin，Qian 和 Weingast(1999)也以地方分成比例作为中国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但加了国有工业分权指标，用地方政府主管的企业产出占该地区全部国有企业的比重来衡量分权度。在考虑到地方官员特征的情况下，他们还借用了 Huang(1996)构建的“官僚整合度”来度量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的距离，据此判断分权程度。但以上考察仅适用于分税制改革前，无法反映出真实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变化。Zhang 和 Zou(1998)则按照传统的地方支出占中央支出比重来计算，并考虑到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因素，进行了人均化处理。Lin 和 Liu(2000)曾创新性地以边际留成比率，即由省一级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提留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度，但这一数据忽略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干预程度，如转移支付的影响等。张晏和龚六堂(2006)针对中国预算外收支和转移支付的特殊性，分别计算了 12 个不同的总量和人均化分权度指标，发现其中的相关性很强。

我们认为，选择财政分权指标时，既要考虑计量的合理性，又要兼顾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还要便于和以往研究比较。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复杂性，使不同级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显得较为模糊(乔宝云等，2005)，所以我们选择用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度量财政分权程度。其中人均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可剔除人口规模影响，又可排除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且除 Zhang 和 Zou(1998)外，不少学者的研究也采用了这一指标(如殷德生，2004；乔宝云等，2005；杨瑞龙等，2007；等等)。

2.“硬”“软”公共品指标。与张军等(2007)的研究基本一致，我们用人均

基础建设支出数据代表“硬”公共品供给。在“软”公共品指标的度量方面，我们选用人均科教文卫支出数据。这两个数据均可在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得到，而且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实证方法

如前所述，由于财政分权和公共品供给以及其他经济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仅采用单一模型不能有效克服这一问题，因此需要建立联立结构方程度量变量间的关系。另外还要考虑到无论是公共品供给还是财政分权都有很强的持续性。对各级政府而言，上期未结束的基础设施建设旧工程会影响下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工；上期财政分权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下期的分权度；上期软公共品支出也影响着下期软公共品支出。处理这种持续性的计量方法是在方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参考 Aschauer(1988、1989)、Rauch(1995)和张军等(2007)的模型，我们选择以下动态计量方程：

$$Y_{i,t}-Y_{i,t-1}=a_0+a_1Y_{i,t-1}+\beta'X_{i,t}+\eta_i+\varepsilon_{i,t} \tag{1}$$

其中：Y是相关变量（人均基础设施支出，人均科教文卫支出或分权度，下文将分别说明）对数值，两期对数值相减，等式左边就代表被解释变量的增长率。X代表除了Y的滞后值以外的其他解释变量集，η是省别效应，ε是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用小写字母表示一阶差分变量，并对(1)式进行差分以消除省别效应，我们得到：

$$y_{i,t}-y_{i,t-1}=\alpha_1y_{i,t-1}+\beta'x_{i,t}+(\varepsilon_{i,t}-\varepsilon_{i,t-1}) \tag{2}$$

因为需要控制滞后的被解释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都是有偏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对此动态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我们的样本不是很大，而 Windmeijer (2005)指出通过有效的 GMM 两步(GMM two-step)估计法计算标准误能显著降低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偏差。因此，我们采用稳健(robust)二步法计算标准误。在 Aschauer(1988、1989)、Rauch(1995)和张军等(2007)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以下结构模型：

$$hpg_t=\gamma_0+\gamma_1HPG_{t-1}+\gamma_2FISDEC_t+\gamma_3AEXR_t+\gamma_4P_t+\gamma'D+\varepsilon_t \tag{3}$$

$$spg_t=\lambda_0+\lambda_1SPG_{t-1}+\lambda_2FISDEC_t+\lambda_3AEXR_t+\lambda_4P_t+\lambda'D+\mu_t \tag{4}$$

$$\begin{aligned}fisdec_t=&\delta_0+\delta_1FISDEC_{t-1}+\delta_2HPG_t+\delta_3SPG_t+\delta_4HPG_0+\delta_5SPG_0+\\&\delta_6AEXR_t+\delta_7(PD_t\times g_t)+\delta_8(PD_t\times g_t)^2+\delta_9PD_t+\delta_{10}LSAVP_t\\&+\delta'D+\zeta_t\end{aligned} \tag{5}$$

变量定义见表1。下标t表示时期。(3)式和(4)式分别表示“硬”“软”公共品供给的决定，(5)式表示财政分权度的决定。(3)式、(4)式中我们将政府行政管理费开支占财政支出比例(AEXR)和人口总数(P)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因为政府行政管理费开支能在很大程度上衡量政府治理效率，而政府治理效率与政府公共品投入是紧密联系的(Shleifer，1997)。在中国这样一个大

国人口规模可能对人均公共品投入有影响，所以加入了人口规模变量。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没有放入人均储蓄额、人口密度等理论上与财政分权度有密切关系的变量，而是将这些变量放在了(5)式的解释变量中。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	说　明
HPG	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对数。hpg 为 HPG 的一阶差分，反映硬公共品增长速度。
FISDEC	财政分权度，等于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总财政支出的比值的对数。fisdec 是 FISDEC 的一阶差分。
AEXR	政府治理效率，等于当期政府行政管理费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
P	地区人口总数。
SPG	人均科教文卫支出额的对数。spg 为 SPG 的一阶差分，反映软公共品增长速度。
PD	地区人口密度。
PD×g	人口密度与人均 GDP 增长率(g)交叉项，衡量是否人口密度越大、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分权程度减小得越快。
HPG_0	基期人均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对数值。
SPG_0	基期科教文卫支出占总支出比率的对数值。
LSAVP	人均储蓄额对数值。
D	含 5 个虚拟变量的向量 D_1-D_5，用以控制相关年度政策差异影响。D_1-D_5 分别在 1989 年、1990 年、1993 年、1994 年、1995 年取 1，其余为 0 。

(5)式中重点考察其系数的变量是人口密度与人均经济增长率的交叉项($PD_t \times g_t$)。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假设 H2 和 H3，这一变量与分权度变化水平应该呈现二次的倒 U 型关系，故在方程中加入了二次项。我们还放入了 HPG_0 和 SPG_0，以控制初始态差异的影响。

考虑到变量的内生性，我们对(3)式和(4)式选取的工具变量为：所有虚拟变量、除虚拟变量和 $FISDEC_t$ 外所有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PD_{t-1} \times g_{t-1}$、$(PD_{t-1} \times g_{t-1})^2$ 和人均外商投资额对数值。对(5)式选择的工具变量为：所有虚拟变量，HPG_0，SPG_0，除虚拟变量、HPG_0、SPG_0 和 $FISDEC_{t-1}$ 外所有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变量，人均 GDP 增长率，滞后一期人均外商投资额对数值。之所以选择人均 GDP 增长率和人均外商投资额变量是因为它们和 FISDEC 密切相关，但和残差项关系不大。

四、样本、数据和实证结果

(一)样本和数据

中国行政区划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4 个直辖市，23 个省，5 个自治区，以及 2 个特别行政区，总计 34 个省份。考虑到数据可比性及样本可得性，我们剔除了 2 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和西藏；再剔除数据不全的河北、吉林、四川与重庆，得到样本地区共 26 个省。1986 年开始“利改税”正式实施，“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也确定下来，可以看作中国财政分权的成

形，故我们选择数据区间为 1986 年后；再根据数据完整性的原则，最终确定样本的时间为 1988 年到 2004 年。本文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资讯网中国统计库和 GTA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2007 版）。并以 1988 年为基期，根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相关变量进行了调整。

（二）描述性统计

首先，我们对除虚拟变量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了平面数据单位根检验。包括：（1）Levin-Lin-Chu 统计量，这一统计量假设截面样本是独立产生的，允许数据有时间趋势和不同横截面及时间序列固定效应。适于检验截面数量多而时间跨度短的样本是否含有单位根（Levin 等，2002）。（2）Im-Peranran-Shin LM 统计量允许误差有序列相关性（Im 等，1997）。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在 5％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假设，说明变量是平稳的。表 2 给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均值和标准差可见，分权度在样本间的波动较大，无论是“硬”公共品供给还是“软”公共品供给在样本间的波动均较小。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HPG	FISDEC	LSAVP	AEXR	PD	P	g	SPG
均值	－5.94	－0.36	7.17	－1.43	352.46	3 675.88	0.156	－4.89
中位数	－5.98	－0.43	7.14	－1.36	229.046	3 512	0.136	－4.99
最大值	－2.19	1.49	10.87	－1.03	2 765.08	9 163	0.485	－1.97
最小值	－7.70	－1.52	4.78	－2.76	6.01	434.20	0	－6.07
标准差	1.06	0.56	0.97	0.29	423.60	2 265.67	0.088	0.65

图 1 和图 2 通过样本散点图和拟合线，分别表现了“硬”“软”公共品供给与财政分权度的相关性。无论是“硬”“软”公共品供给，都与财政分权度高度正线性相关。说明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对“硬”“软”公共品供给都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从图中还可以看出，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硬”公共品的增长速度明显较“软”公共品快。但是，由于存在其他变量的影响及变量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对于财政分权度与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还要进行更深入的计量检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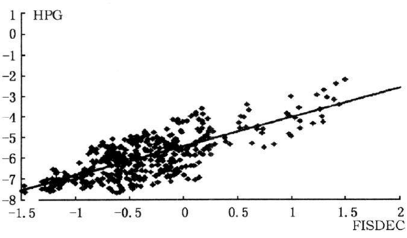

图 1　HPG 与 FISDEC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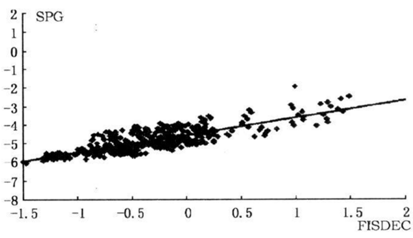

图 2　SPG 与 FISDEC 的关系

图 3 通过样本散点图和拟合线,表现财政分权度增长程度与人口密度和人均 GDP 增长率交叉项(PD×g)间的关系。其相关性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并且可用倒 U 型二次方程来较好拟合。此外,大部分样本都分布在倒 U 型曲线上升一侧,只有少数样本分布在曲线下降一侧。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人口密度高且经济发达的地区仍非常少,多数地区仍需要分权度快速增长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说明少数较发达地区分权度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与我们理论分析的推论也基本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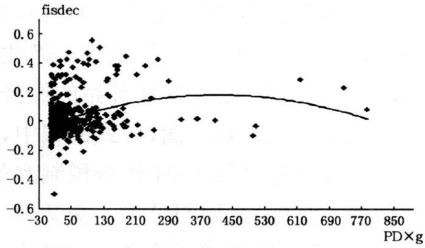

图 3 fisdec 与(PD×g)的关系

(三)回归结果

表 3 是(3)式、(4)式的回归结果。由表 3 可见,分权度与“硬”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分权度提升会使地方政府加快“硬”公共品供给,而减缓“软”公共品供给。于是我们证明了研究假设 H1。政府行政治理效率与“硬”公共品增长速度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与“软”公共品增长速度关系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软”公共品供给与分权的内生关系更强。政府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更接近“发展型政府”而不是“吃饭型政府”。在我国,“发展型”政府更愿意投资“硬”公共品而不是“软”公共品。前期“硬”公共品供给量对“硬”公共品供给速度有显著的负作用,这也符合我们的推断,因为当“硬”公共品达到一定数量后,基数越大速度提升就越难。前期“软”公共品供给量对“软”公共品供给速度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政府“软”公共品提供不足,“软”公共品需求和供给确实处于急剧增长时期。人口规模与人均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关系不大,且无论人口规模变量是否进入模型,对其他变量都没有明显影响。说明单纯的人口因素对政府决策影响甚微。

表 3 公共品供给速度与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

	hpg_t		spg_t	
HPG_{t-1} 或 SPG_{t-1}	−0.046***(−2.86)	−0.051**(−2.42)	0.307***(3.23)	0.295***(3.23)
$FISDEC_t$	0.159*(1.65)	0.172*(1.69)	−0.355**(−3.05)	−0.338***(−2.93)
$AEXR_t$	−0.145**(−2.56)	−0.151**(−2.49)	0.008(0.51)	0.008(0.49)
P_t		-3.55×10^{-6}(0.50)		-3.22×10^{-7}(−0.10)
D_1	−0.020(−0.42)	−0.019(−0.38)	−0.022(−1.40)	−0.022(−1.37)
D_2	−0.081**(−2.04)	−0.080**(−2.01)	−0.064***(−8.08)	−0.063***(−8.26)
D_3	−0.013(−0.55)	−0.012(−0.50)	0.063***(7.03)	0.062***(7.08)
D_4	−0.027(−0.67)	−0.030(−0.68)	0.006(0.22)	0.003(0.09)
D_5	0.027(0.66)	0.024(0.56)	0.099***(2.79)	0.094**(2.69)
常数项	−0.309**(−2.39)	−0.329**(−2.19)	1.503***(3.47)	1.450***(3.41)
Arrelano-Bond 一阶自相关检验(P 值)	0.001***	0.001***	0.007***	0.006***
Arrelano-Bond 二阶自相关检验(P 值)	0.349	0.343	0.755	0.783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P 值)	0.721	0.651	0.661	0.608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统计显著。(2)考虑滞后项的样本数为 390。

虚拟变量 D_2 的系数为负且统计显著,说明1989年的形势无论对“硬”公共品供给还是“软”公共品供给都产生了抑制作用。(3)式回归中,D_3-D_5 系数均不显著,说明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硬”公共品供给速度无影响。而(4)式回归中,D_3 和 D_5 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和1994年分税制改革都加快了“软”公共品供给。

表4是(5)式回归结果。交叉项($PD_t \times g_t$)系数为正,而$(PD_t \times g_t)^2$ 系数为负,可见分权度增长速度与交叉项($PD_t \times g_t$)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这说明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而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那么,人口密度较高而经济较差的地区情况又会怎样呢?结合图3分析可见,这些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于是我们就证明了研究假设H2和H3。HPG_t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硬”公共品供给对财政分权有激励作用。SPG_t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软”公共品供给对财政分权有抑制作用。PD_t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口密度变量对分权有抑制作用。我们对此的解释是,随着经济增长,公众对“软”公共品供给增长的要求已超过了“硬”公共品。$AEXR_t$ 系数为正且有一定的显著性,进一步证明“发展型”政府更愿意投资“硬”公共品而不是“软”公共品,因而更偏好高分权度。

表4 分权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

	$fisdec_t$		
$FISDEC_{t-1}$	0.508* (1.94)	0.410*** (2.63)	0.361*** (2.99)
HPG_t	0.066* (1.85)	0.044** (2.13)	0.175*** (3.42)
SPG_t	−0.407* (−1.95)	−0.332** (−2.67)	−0.271*** (−3.27)
HPG_0			−0.119*** (−3.16)
SPG_0			−0.131(−1.36)
$AEXR_t$	0.207* (1.75)	0.173** (2.43)	0.015(0.23)
$PD_t \times g_t$	0.004*** (5.56)	0.004*** (6.70)	0.004*** (7.39)
$(PD_t \times g_t)^2$	-3.99×10^{-6}*** (−3.59)	-3.58×10^{-6}*** (−4.72)	$-3.45\times10^{-}$*** (−5.88)
PD_t	−0.0003*** (−5.37)	−0.0003*** (−6.96)	−0.0004*** (−5.39)
$LSAVP_t$		0.016(0.64)	−0.062** (−2.10)
D_1	0.019(0.78)	0.017(0.79)	0.025(1.11)
D_2	0.112*** (2.98)	0.106*** (3.37)	0.117*** (3.29)
D_3	0.249*** (3.90)	0.227*** (5.38)	0.228*** (6.14)
D_4	−0.340*** (−3.60)	−0.306*** (−5.15)	−0.280*** (−7.47)
D_5	−0.100(−1.37)	−0.077(−1.55)	−0.048(−1.22)
常数项	−1.128* (−1.83)	−1.080** (−2.03)	−1.542*** (−2.78)
Arrelano-Bond 一阶自相关检验(P值)	0.014**	0.011**	0.011**
Arrelano-Bond 二阶自相关检验(P值)	0.282	0.183	0.288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851	0.586	0.997

注:(1)同表3(1)。(2)考虑滞后项的样本数为416。

D_2 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1989年的形势对分权有促进作用;D_3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1993年经济过热刺激了分权度的提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加大了财政支出力度。D_4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分税制改革在短期内就

减弱了地方分权度。此外,表 3 与表 4 中所有的 Arrelano-Bond 一阶自相关检验显著而二阶自相关检验不显著,及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也不显著,说明我们的模型设计和工具变量选择均较合理。

五、结　论

转型经济中,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互动关系。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我们构建了动态结构模型,运用系统 GMM 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对“硬”公共品和“软”公共品的供给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财政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着明显加速作用,而对“软”公共品供给却有着明显抑制效果。所以,财政分权及其所带来的标尺竞争效应,是使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教育、医疗等“软”公共品供给领域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2)财政分权程度与人口密度、经济增长速度间有着微妙而密切的联系。人口密度较高、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分权程度会加强,人口密度较高、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分权程度会减弱。因此,地区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都对财政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3)政府治理水平对分权程度的增加有明显作用,“发展型政府”更倾向于“硬”公共品投资,因而也就更偏好高分权度。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公众的偏好对我国政府的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关系至关重要。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对“软”公共品提供的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公众偏好要求加强“软”公共品供给,在地方经济不是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就必须降低分权程度。在这一阶段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矛盾,表现为公共品供求关系的不和谐。因此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而言,目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分权程度降低与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我们认为,降低 GDP 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减弱标尺竞争,更好地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均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需谨慎细致对待的关键问题。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后软性公共品供给减少,而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公众对软性公共品的需求在增加,但软性公共品的供给增长却不能满足公众需求的增长。

参考文献:

[1]丁菊红,邓可斌.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8,(7):78—89.

[2]Akai N, M Sakat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 52, 93—108.

[3]Arellano M, S Bond.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58: 2,277—297.

[4]Arellano M, O Bover.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68:1, 29—51.

[5]Bird M Richard. Threading the fiscal labyrinth: Some issues 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4,46:207—277.

[6]Jin H Y Qian, B Weign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89, 1719—1742.

[7]Levin A, C F Lin, C S Chu.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Asymptotic and finites sample propertie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2,108, 1—24.

[8]Lin J Y, Z Li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49:1, 1—21.

[9]Oates, Wallace E.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37:1120—1149.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in Economic Transitio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Evidence from China

DENG Ke-bin[1], DING Ju-ho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tes the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in economic transition of china. Then it sets up a dynamic structure model to control the intrinsic relation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b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It proves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through system GM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positive effect on "hard"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passive effect on "soft" public goods supply. The speed of decentralization in less-developed regions is increasing, and the districts with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higher increasing speed. The speed of decentralization in more developed regions with higher-population-density is decreasing. 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level and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Developing-type governments prefer "hard" public goods to "soft" ones, so they prefer hig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goods supply; structure model; system GMM

(责任编辑　许　柏)